

## 書 評

郭 雨 穎\*

程永超

《華夷變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関係史の研究》

大阪：清文堂，2021 年，374 頁，ISBN 9784792414979

東亞世界的交通往來所涉及到的研究課題極廣，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是跨文化交流之傳播者。例如楊聯陞先生（1914-1990）定義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媒介人物」（professional intermediate agents），舉凡外交方面的使節、經濟方面的買辦（如：海商）、宗教方面的僧侶與傳教士、文化方面的譯官（如：通事）皆屬此列，不一而足。<sup>1</sup> 然就官方角度來看，「媒介人物」定義往往落在肩負赴外交聘重任的使節身上，以日本為例，自中古以來即有派往中國的遣隋使、遣唐使，隨著時代邁入近世時期，則有遣明使（勘合貿易），其目的乃在通過使節進行文化交流與互攝，以期達到知識、情報環流的作用。逮至豐臣秀吉（1537-1598）發起侵略朝鮮戰役（明朝稱：萬曆朝鮮之役；豐臣政權稱：文祿・慶長之役；朝鮮王朝稱：壬辰倭亂、丁酉再亂），伴隨日本國內豐臣政權瓦解、德川幕府建立等情勢演變，乃至中國迎來「明清鼎革」之歷史大變局——「華夷變態」的

---

2022 年 8 月 23 日收稿，2023 年 2 月 15 日修訂完成，2023 年 4 月 28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

Kuo Yu-ying, master'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 楊聯陞，〈中國文化中的媒介人物〉，《大陸雜誌》15.4(1957.8): 29-33。

展開，<sup>2</sup>「華夷變態」此一概念可說強烈地衝擊當時東亞世界秩序的內在邏輯（華夷之辨），同時亦使中、日、朝三方在外交策略上有著劇烈變化。

日本東北大學程永超教授（1989-）為釐清「華夷變態」所造就之變化在日本（豐臣政權、德川幕府、對馬藩）、朝鮮王朝，與中國（明、清）三方關係發展中的歷史脈絡，與國際秩序的遞嬗，進而廓清對近世東亞世界交通往來的認識，撰成《華夷變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關係史の研究》。本書係以作者的博士論文為基礎改寫而來，<sup>3</sup> 論述重點圍繞在近世東亞三國有關使節交聘、情報蒐集、貿易等課題，以下將分別展開評述。

### 一、燕行使與通信使之間

近世時期東亞使節赴外交聘，以朝鮮王朝的燕行使與通信使所留下的文獻最為豐贍，故亦成為後人探究近世東亞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然而，相較於過往研究側重在燕行使「事大（朝天）」、「赴京」之使行，亦或通信使「交鄰」、「誠信」之使行，作者則舉出同時擁有燕行使與通信使經驗的吳允謙（1559-1636）和洪啟禧（1703-1771），通過兩位「重複經驗」者來挖掘朝鮮使節的定位及其特殊性。要之，所謂「重複經驗」者由於同時兼具赴中國與日本的交聘經驗，故其外交視野亦較僅具有「單一經驗」者更為開闊。

吳允謙係德川幕府建立（1603）之初，日本、朝鮮關係尚未明確化前即擔任「回答兼刷還使」（1617，明萬曆四十五年；日本元和三年；朝鮮光海君九年）的角色，赴日本京都伏見城謁見幕府二代將軍德川秀忠（1579-1632），此次「海路」經驗同時也開啟了他通過「海路」赴明朝擔

2 此概念主要源自江戶初期儒者林春勝（1618-1680）編纂之中國情報、勢態報告書（唐船風說書）——《華夷變態》，其中又以〈序言〉「華變於夷之態也」、「夷變於華之態」兩句前後呼應，從而揭示該書主旨。（日）林叟，《華夷變態》（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延寶二年〔1674〕序本）。

3 程永超，「通信使・燕行使と近世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博士學位論文，2018）。

任「登極使」（1622，明天啟二年，祝賀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登基）的「朝天」路線，從而開拓了後來的「遼海貢路」，成就其「重複經驗」。洪啟禧的「重複經驗」則落在他對語學的關心，關鍵乃在於洪啟禧本人十分精通「華語」，又在出使日本時獲知接待朝鮮使節的對馬藩儒兩森芳洲（1668-1755）擁有三國語言能力後，以日本儒者作為比較對象，進而深刻地意識到朝鮮譯官素質之「迷劣」與不足，因而在返國後即將心力投注到語言與聲韻學，除己身著有《三韻聲彙》外，亦向朝廷提案修訂並重新刊行作為日語教材的《捷解新語》，以及作為中國語教材的《老乞大》、《朴通事》乃至《洪武正韻》，以期提升赴外交聘使節的通譯能力。

以同時兼具赴中國與赴日本的「重複經驗」者為研究對象，在於可以窺見朝鮮使節對當時東亞局勢的整體觀察，進而體知朝鮮王朝在「事大（朝天）」、「交鄰」間的不同態度，乃至使節與不同政權、文化體系交流後所得到的實際反饋及後續引發的迴響。可惜的是，本書僅將吳允謙和洪啟禧的「重複經驗」分開論述，並沒有將兩位身處「不同時代」<sup>4</sup>的「重複經驗」者置於「明清鼎革」之「前」、「後」的歷史脈絡來進行比較。若能在「重複經驗」基礎上更進一步地開展論述，不但能窺見朝鮮王朝國策的轉變，亦能深入內在脈絡把握士人思維理路、文化心態，進而可以在既有使節研究上取得突破，同時亦能呼應本書揭櫫「華夷變態的東亞」之題旨。

## 二、作為中介者的朝鮮王朝：近世東亞情報網絡之建構

### （一）倭情咨文與明清中國

德川幕府建立後，德川家康（1542-1616）亟欲修補此前豐臣政權與朝鮮王朝因戰爭所導致的破碎外交關係，其目的的主要是重啟與明朝交易的

4 吳允謙亡於「明清鼎革」前，與「丙子胡亂」（1636）同年；洪啟禧則活躍於朝鮮英祖（李昉，1694-1776）時期，同時亦是作為「尊周思明」理念的提倡與實踐者，參見（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英祖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第78冊，서울：國史編纂委員會；東國文化社，1955-1958），卷116，「英祖四十七年六月六日」條，頁38b。

「貢路」，同時也是為了掌握大陸情報，希望藉由對馬藩作為與大陸交往之渠道，透過朝鮮王朝來與明朝達到交涉，但前後共計五次的交涉，最後仍以失敗告終。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指出，朝鮮王朝並非僅是作為幕府向明朝詢問恢復國交——「通貢」意向的窗口，事實上，他更是被宗主國明朝賦予蒐集「倭情」的重要任務，如明代《神宗實錄》即有諭令朝鮮國王（宣祖李昞，1552-1608）「天朝興廢，顧護至意，仍遠偵密探，無論有無警息，每二月一報鎮江遊擊衙門，如有重大情形，不時馬上馳聞」的載記，<sup>5</sup> 朝鮮王朝《宣祖實錄》亦有「邊報二月一報，此係聖旨，不輕為之」的相關記載。<sup>6</sup> 對勘兩條史料則能確知明朝對「倭情」的關注，從中亦彰顯了朝鮮王朝對明朝「事大」態度的不敢悖慢。

清朝入關前，皇太極（1592-1643）同樣希望通過朝鮮作為渠道來蒐集日本情報，特別是在「丙子胡亂」（1636）後，朝鮮王朝臣服清朝，確立了雙方臣屬關係。尤當注意的是，在「三田渡盟約」中皇太極給朝鮮仁祖（李宗，1595-1649）的「敕諭」中有「日本貿易，聽爾如舊。但當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彼也」的記載，顯見清王朝對日本的關注，即試圖通過獲取朝鮮通信使回傳之情報，與日本展開交涉。本書指出，以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日本寬永二十年）通信使赴日使行最具代表性，原因在於，朝鮮王朝之所以一轉往昔遣使日本的「消極」態度，反而更加積極地蒐集「倭情」（此時正逢德川幕府四代將軍德川家綱〔1641-1680〕出生以及日光東照宮竣工），此舉係朝鮮王朝為謀求與日本外交的穩定發展，因而積極取得清朝認可，進而遣使赴江戶交聘，同時亦使此一程序（遣使前須奏報）成為慣例；<sup>7</sup> 另一方面，這樣帶有對東亞時局關心的意圖其實來自皇太極直接的政治干涉，或與正逢「明清鼎革」之際，皇太極對中國「華夷變態」於當時東亞世界影響極為關心有關。

5 明·顧秉謙等奉勅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神宗實錄》，（《明實錄》第11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416，「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條，頁7831。

6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宣祖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第115冊），卷217，「宣祖四十年十月十七日」條，頁7b。

7 此處承審查人意見提示，特此謝忱。

## (二) 德川幕府與朝鮮通信使之外交韻頡

關於朝鮮王朝與日本的外交與情報傳遞，本書指出應當關注朝鮮王朝最後一次派往日本之通信使（1811，清嘉慶十六年，日本文化八年，朝鮮純祖十一年）係改採「易地聘禮」的模式，<sup>8</sup>有關此次德川幕府與通信使互動的敘述，作者將重點放在幕府方面主持外交事務的儒者身上，側重儒官古賀精里（1750-1817）通過《擬問擬答》的編纂，與朝鮮通信使「預演」相關的「問」與「答」來應對「易地聘禮」之筆談，展開論述。要之，幕府「預演」的「筆談」內容其實帶有蒐集大陸（中國、朝鮮、俄羅斯）情報之政治目的存在，故在聘禮結束後要進呈給大學頭林家（林述齋，1768-1841）與幕府檢閱。是以，幕府儒者與朝鮮使節的交流即特別著眼在朝鮮王朝國情、文化、禮俗之理解，通過「擬問」來試探朝鮮使節對儒家經典熟稔與否，又或「易地聘禮」前不久發生俄羅斯入寇松前藩一事（文化露寇〔文化四年〕，1807），幕府官方即試圖通過對朝鮮使節之「擬問」來探知俄羅斯對當時東亞秩序挑戰下清朝於北方邊境的因應之道，也因此，圍繞這些議題所展開的「筆談」，自然帶有相互韻頡、彼此交鋒之意圖。必須闡明的是，此一取徑，不若以往研究糾結於外交（交鄰）場合所揭櫫的「誠信」，但使節卻往往囿限於國家顏面，故而在「筆談」過程、「詩歌酬唱」內容產生所謂「失實」問題，<sup>9</sup>而是應當正視背後原本即帶有之政治目的，如此方能還原日本儒者、朝鮮使節的政治意識形態及文化心態。

至於近世日本、朝鮮王朝的外交關係，乃至與中國方面的交涉，對馬藩當是不可忽略的要角，尤其是當德川幕府亟欲修復與朝鮮王朝之外交關係時，對馬藩即擔任對朝鮮事務的外交窗口。作者指出，幕府不論是對明、對朝鮮外交，均是通過對馬藩進行交涉，如在1604年（德川幕府開府隔年：日本慶長八年；朝鮮宣祖三十七年）幕府即希望透過朝鮮通信使向明朝交涉，表達欲與中國貿易，進而恢復國交的宿願，但本書比較中、

8 張伯偉，〈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中華文史論叢》2017.2(2017.6): 147-183。

9 即德川幕府因財政緊絀，故而將聘禮地點從原本的江戶藩改到對馬藩，朝鮮通信使僅須至對馬藩與幕府官員進行國書交換儀式即可，不必親赴江戶藩謁見幕府將軍。

日、朝三方史料後發現，在交涉過程中，對馬藩與朝鮮王朝在處理外交事務背後，不時帶有明朝與幕府的政治角力。要之，根據「朝鮮自任咨文」所載「觀變策應，相機區處，毋得專諉天朝（明朝），因循延緩，致滋兩誤」原則，明朝將對日本外交權力適度地下放給朝鮮王朝自主權衡。<sup>10</sup>不過後來雙方交流也僅止於《己酉約條》（1611，明萬曆三十九年；日本慶長十六年；朝鮮光海君三年）訂立後的日、朝貿易。日後對馬藩使者再向朝鮮官員表達上京與建立國交的願望則一概遭到拒絕，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視作朝鮮王朝秉持「朝鮮自任咨文」的原則，當然也不免有朝鮮王朝利用明朝牽制德川幕府及對馬藩的政治意圖和外交手段。

### 三、對馬藩之地位再衡定：國交恢復、情報蒐集與貿易

#### （一）國交恢復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朝鮮王朝雙方交涉過程中，對馬藩主宗義成（1604-1657）屢次出於私意偽造、竄改幕府致朝鮮國書、禮單之情事，後來為家臣柳川調興（1603-1684）所揭發（史稱：「柳川一件」），進而導致幕府收回對朝鮮王朝外交的主導權。相關研究，如田代和生（1946-）雖針對「柳川一件」之始末進行詳實的梳理，<sup>11</sup>但她僅止聚焦在「柳川一件」後幕府及朝鮮王朝外交體例的確立，<sup>12</sup>以利展開國交恢復後貿易關係的探討，對「柳川一件」後對馬藩於日本、朝鮮外交關係之地位並未詳加討論。又如荒野泰典（1946-）指出德川幕府主要係通過「四個口（四つの口，即長崎—中國、對馬藩—朝鮮王朝、薩摩藩—琉球國、松前藩—蝦夷地）」來處理對外關係，其中，對馬藩除了要擔負對朝鮮王朝的貿易與

10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宣祖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第 99 冊），卷 174，「宣祖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條，頁 9a。

11 （日）田代和生，〈改ざん発覚す——柳川事件〉，《書き替えられた国書——徳川・朝鮮外交の舞台裏》（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頁 123-181。

12 （日）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1），第 5 章〈日朝外交体制の確立〉，頁 116-144。

外交業務外，在戰事發生時亦須起到動員作用，此一認識係築基於幕府本是作為武家政權，且又頒行「幕藩體制」的緣故。據此，荒野泰典指出，幕府賦予對馬藩地位其實帶有「軍事」以及「知行（行使領地支配權，如：徵稅、徵兵）+朝鮮貿易」的雙重性格。<sup>13</sup>

## （二）情報蒐集

本書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加以大量徵引對馬宗家留存下來的相關史料，更細緻化地釐清對馬藩在德川幕府、朝鮮王朝外交往來之間所扮演的角色。通過梳理對馬宗家史料，作者指出，「柳川一件」後幕府取回對朝鮮王朝外交的實權，對馬藩不再具有特權（如：免除參勤交代），轉而作為接待朝鮮通信使的角色，對馬藩固然是幕府與朝鮮王朝（甚或明、清中國）貿易往來的重要管道，但對馬藩實際上卻是被幕府賦予蒐集朝鮮，乃至於大陸（中國）情報的任務，從對馬宗家上呈幕府之史料來看，其中有關「唐兵亂」（指中國方面發生動亂，如：明清交替戰事、太平天國之亂皆屬此列）的記載即可窺見——謹慎地蒐集大陸情報乃是對馬藩的「第一職務（御役職第一）」<sup>14</sup>。是以，就外交角度來說，幕府雖未能與中國方面建立直接且實質的外交關係，但對於當時大陸情報的掌握仍認為有優先性與必要性。通過對馬宗家史料的解讀，加以對馬藩與朝鮮半島的地緣關係，自古以來即帶有外交上的自主性，可以確知對馬藩在「朝鮮王朝—（對馬藩）—德川幕府」的情報、貿易網絡建構上有其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亦可窺見德川幕府試圖恢復與明朝、朝鮮王朝外交關係的背後，其政治（軍事）目的不亞於經濟層面的貿易往來。

## （三）貿易

本書在論及中朝貿易往來時，亦提拈出朝鮮王朝、對馬藩居中的地位與影響力，通過田代和生所揭櫫的「銀之路」（以白銀購置生絲、織物，路線：〔起〕京都伏見→首爾→北京〔訖〕）與「絹之路」（以生絲、織物換取

---

13 （日）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第2部第1章〈大君外交体制の確立〉，頁161-243。

白銀，路線：〔起〕北京→首爾→京都伏見〔訖〕<sup>14</sup> 以及朝鮮使節赴中國所進行的「八包貿易」（與清朝商人、民眾進行私貿易，以作為公費使用），作者指出，由於朝鮮王朝「嚴格化」、「規制化」與中國之間的「八包貿易」，通過「八包定數」限縮白銀的流通，其中尤以韓祉擔任義州府尹時期的檢查施行最為澈底，使節無法攜帶足夠的白銀於北京購得中國優質的生絲、織物，導致攜回貨物品質惡劣、價格高騰，因而朝鮮使節、譯官、商人（東萊府商人）通過游說於倭館任職之代官、對馬人，乃至透過東萊府使上奏朝廷，希冀勸緩官方對白銀管制的強化，以拯貿易衰微，此則「八包一件」的歷史背景。本書指出，通過「八包一件」可以窺知，儘管「八包貿易」起初僅是作為中朝貿易的一環，但在當時「銀之路」與「絹之路」的貿易循環下，朝鮮作為中國、朝鮮王朝、德川幕府三方之間的中繼站，通過使節、商人的來往，仍緊緊維繫著三者之間的經濟關係，而對馬藩居中的表現，同時亦揭示了中朝貿易與日朝關係之間密不可分的連動性。

#### 四、有待開拓與深掘的學術課題

綜觀全書，以往論及東亞世界「媒介人物」的交流，由於係從「漢字」作為知識載體的觀點出發，故多側重在「漢詩」外交，<sup>15</sup> 乃至使節之間的「筆談」、<sup>16</sup> 近年來東亞使節研究亦開始關注到情報蒐集與交換，<sup>17</sup> 然而，相較於前人研究側重在情報交流的區域連動性，<sup>18</sup> 本書則是通貫兩者，關

14 (日) 田代和生，〈「鎖國」時代の日朝貿易——銀の路・絹の路——〉，《經濟史研究》14(2011): 1-24。

15 村井章介指出「漢詩」於東亞外交場域的意義，見氏著，〈序〉，《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頁 i-iii。

16 (日) 金文京，〈漢文による筆談〉，收入氏編著，《漢字を使った文化はどう広がっていたのか——東アジアの漢字漢文文化圏》（東京：文學通信，2021），頁 398-402。

17 如沈玉慧的博士論文，見氏著，「清代における朝貢使節の相互交流と情報収集——朝鮮燕行使を中心としてみた——」（福岡：九州大學人文科學府博士學位論文，2013）。

18 鄭潔西《跨境人員、情報網絡、封貢危機：萬曆朝鮮戰爭與 16 世紀末的東亞》（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一書指出，應當注意到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戰爭時，



注在以「筆談」、「漢詩」作為載體的情報傳遞，以此來探討背後帶有的政治意圖與外交意義。也正是基於此一關懷，作者更加細緻化地處理德川幕府訴諸「入貢」明朝後展開的外交史歷程，除了重新衡定對馬藩於「日一朝」外交關係上的地位與意義外，更揭示隱藏於「中一朝一日」三國背後的情報傳遞網絡，提醒我們應當正視朝鮮王朝在「日一朝」與「中一朝」外交之間扮演的角色。要之，朝鮮王朝在德川幕府嘗試與明朝建立國交關係失敗的情況下，居中扮演了外交情報傳遞的要角，亦釐清了朝鮮通信使所提供之「倭情咨文」與明朝外交國策的內在關聯性，挖掘情報傳遞最深層的關懷——對「華夷變態」之關注。就此而言，通過跨越三國藩籬、四方（德川幕府、對馬藩、朝鮮王朝、明清中國）關係等複數因素交織之視域，來重新看待近世東亞歷史。以此視角，我們得以重回近世史脈絡中朝鮮使節（燕行使、通信使），甚或德川幕府儒者、明清官員所擔綱的「媒介人物」於文化交流層面的影響，乃至認識朝鮮王朝、對馬藩作為文化交流「中介者」（intermediary）地位的歷史意義。

也正是出自對朝鮮王朝作為「中介者」的關注，本書指出應當正視日、朝外交背後的「中國因素」，此係呼應葛兆光（1950-）所揭示的，在近世東亞的外交場域上，「中國因素」當是作為「不在場的『在場者』」，自本書所觀照的使節、情報網絡、貿易等研究課題來看，我們確實可以窺見「中國因素」無時不刻地發揮其影響力——尤其是針對朝鮮王朝的外交態度而論。但若更進一步地溯源，葛兆光定義所謂不在場的「在場者」，所指應為：「傳統中國向周邊漫延開來的古典知識、禮樂制度和藝文意境，仍然作為近世東亞諸國文化人的共同『經典』，在文化比賽中充當了評頭品足、較長論短的尺度。」<sup>19</sup> 質言之，「中國因素」除了指認政府、官方實質的政治影響力外，當重視其背後深厚的文化底蘊，乃至乘載「禮樂制度」的知識體系。

---

情報流通對於近世亞洲（明代中國、日本、朝鮮王朝、琉球國、女真政權、暹羅等）影響的整體連動。

19 葛兆光，〈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中華文史論叢》2014.2 (2014.6): 47。

有關近世東亞使節交流背後，依循「禮樂制度」（所謂「中國因素」）構建出「交鄰」與「事大」外交秩序的研究，至今仍然乏善可陳。夫馬進（1948-）指出近世外交場合中「中華」的「在」或「不在」，或是當「春秋之義」、「禮的精神」作為近世東亞世界共同文化底蘊、知識體系的同時，兩者皆對作為外交秩序原理的「交鄰」與「事大」，提供了更為根源性的思想論據。<sup>20</sup> 是以，對思想史溯源的清理動作，當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地掌握近世東亞交流史的實像。亦如岡本隆司（1965-）所呼籲的，對於「交鄰」歷史現象的解讀，應當跨越「國別史」、「一國史」的藩籬，以此視角來重新看待使節研究。質言之，不論「交鄰」與「事大」的原理運用都不是服膺於宗主國政治實力的全然搬照，而係如本書揭示朝鮮士人對「朝鮮自任咨文」外交原則運用之具有自主意識。因此，不宜簡單地使用「敵禮」、「對等」、「誠信」等字眼來統括對「交鄰」的認識。<sup>21</sup> 此語不但提醒我們，應當要自近世東亞各國不同的政治場域、文化體系內部來重新看待士人階級對「交鄰」與「事大」外交秩序原理的運用，始能重新衡定其意義，修正既有研究觀點，還給近世東亞交流史一個本來面目。就此而論，本書所昭示通貫中、日、朝三國視角來俯瞰近世東亞交流史的取徑，可謂具「嚆矢」地位。

儘管燕行使研究及燕行錄相關文獻的發掘、解題<sup>22</sup> 已然蔚為風潮；朝鮮通信使相關文獻資料作為構建日本（德川幕府）與朝鮮王朝和平與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見證，亦於 2017 年 10 月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收錄為「世界記憶遺產」（Memory of the World），後續引發的研究浪潮相當可期。但若我們能在本書揭櫫情報傳遞網絡的基礎上，正視前述葛兆光、夫馬進與岡本隆司所指摘先行研究的未足之處，通過考究外交文書，乃至情報中蘊含的「微言大義」，重新衡定潛藏於情報傳遞之間的國家意識與文化意識，或能更有助於對「華夷變態」的歷史（政治

20 （日）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第 1 章〈朝鮮の外交原理、「事大」と「交隣」〉，頁 28-44。

21 （日）岡本隆司編著，《交隣と東アジア——近世から近代へ——》（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21），序章〈「交隣」とは何か〉，頁 1-17。

22 漆永祥，《燕行錄千種解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史、外交史、思想史)脈絡來進行辨析。事實上，通過本書所揭示的研究課題，可以窺見近世東亞情報蒐集背後處處充滿政治角力，這自然是「華夷變態」所導致之結果，因而衍生出研究者所歸納日本「日本型華夷意識」<sup>23</sup>與「日本型華夷秩序」、<sup>24</sup>甚或是史料當中即可見的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主義、意識)」等自我覺知。相對於傳統中國的「華夷之辨」，我們應當正視「華夷變態」此一概念在近世東亞世界之政治場域、知識體系下的「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與「再生產」(reproduction)。職是之故，在「華夷變態」此一歷史變局下，訴諸「交鄰」與「事大」外交秩序的原理建構，及其如何於近世東亞世界開展等相關課題，仍然江山可待，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地探掘。

---

23 (日)朝尾直弘，〈鎖国制の成立〉，收入(日)歷史學研究會、日本史研究會編，《講座日本史4：幕藩制社会》(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頁59-94。

24 (日)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第1部第2章〈近世東アジアと日本〉，頁29-40。

